

政党建置与

民国政局

走向

Party Form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Regim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杨天宏 ◇ 著

政党建置与
民国政制 走向

**Party Form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Regim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杨天宏◇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

著 者 / 杨天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魏小薇
责任校对 / 贾凤彩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25
字 数 / 429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373 - 1/K · 0037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本书收录的是杨天宏教授近年发表的有关民国史研究的部分论文。作为受业弟子，我们跟从先生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少则一年，多则六年，朝夕相处，讨教学问，对于先生的道德文章，自忖有比他人更深的认知。

适逢国家恢复高等教育考试制度逾 30 年，先生 1978 年春进入大学学习并研究历史，至今正好 30 周年。为了纪念国家教育政策 30 年前发生的重大变化，也为了纪念在业已逝去的岁月里先生他们那一代学者作出的学术贡献，特选编此论文集。基于编者立场，须作如下交待。

在时间上，先生既有的研究领域跨越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代，此番编辑，只选取民国史研究的相关论文。收入文集的论文凡 21 篇，其中《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梁启超与宋教仁议会民主思想之比较》及《“人权”讨论与胡适的政治思想》3 篇曾为 8 年前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收录，为了全面反映先生对民国史特别是民国政治史的研究状况，在征得原出版社及先生同意的前提下，此次一并录人文集。

文集由四编合璧而成：第一编收录涉及民国时期政党与国会政治的论文 5 篇，偏重制度建设之研究，可供认识了解当时国人在借取西方政治制度过程中的政治分歧与妥协。第二编收录论述民国初

年权势转移与政治格局变化的论文 6 篇，侧重民初政治的实际运作及变化，内容包括苏俄、中共与国民党的“左右”分化，国民党与皖系领袖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的关系，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以及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等。第三编收录有关民族主义与北伐前中国外交的论文 5 篇，意在揭示斯时中国政治中的外国因素以及中国职业外交家秉承民族主义进行的抗争。第四编收录讨论民国学术与宗教的论文 5 篇，其中 3 篇关乎思想学术，2 篇关乎宗教。时间严格控制在民国范围，个别事件延续到了 1950 年代初，系因生发之主要时段是在民国，故未剔除。

关于书名，为避免出现先生忌讳的将作者姓氏冠入书名的标识法，同时考虑到先生近年来对政制史的特别关注，故将先生 2007 年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一篇论文的题目《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稍加改动，作为论文集的书名。这当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收录在文集中的论文所涉及者并非民国政制史一个领域，单一的论题殊难涵盖多面的论域。不过正如学者早已注意到的那样，在近代中国内政与外交已经“打成一片”、不复可分的特殊语境中，将具有民族主义内涵的外交纳入国内政治史的研究范畴，应当不是分类上的逻辑混淆。同样，也正如学者业已指出的那样，在近代中国许多学者（如梁启超、胡适、丁文江等）对于政治参与爱恨交织，欲罢不能，学术、宗教已经与政治趋于一途或瓜葛纠缠的泛政治化背景下，将有关学术及宗教的论文收入主题为“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的论文集，或许可以避开名实不符的批评与指责。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论文集内容与形式设计的周至。实际上，先生的论文亦存在连他自己都不甚满意之处。比如，一些关乎近代中

国民主政制建设的重大问题，或因研究条件尚未充分具备，虽曾涉及，却未深究，浅尝辄止，鲜关痛痒，颇犯古人针砭作文“欲说不说，不说又说”之病。对此，先生曾引为自责。作为学生，也就不必为尊者及长者讳。

近年来，民国政制史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但愿这本覆盖政治、外交、文化及宗教的“政制史”论文集的编辑出版，不仅能够为诸如我们这样的在校硕士、博士研究生提供一类学习研究民国历史的论文范本，也能够为民国政制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一些方法上的启示和借鉴。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颜玖升

2008年5月1日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编 民国时期的政党与国会政治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	3
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	51
梁启超与宋教仁议会民主思想之比较	77
民初国会制度衰亡之政治语境分析	96
胡适与 1934 年全国考铨会议	120

第二编 权势转移与民初政治格局变化

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	141
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	160
苏俄、中共与国民党的“左右”分化	181
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	211
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	231
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245

第三编 民族主义与北伐前的中国外交

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的外国因素	263
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	273
北洋外交与“华府条约”框架的突破	303
民族主义与中国教会教育的危机	329
北伐期间的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人问题	347

第四编 泛政治化背景下的民国学术与宗教

新文化运动思想文化目标与取径辨析	383
趋向政治化的近代中国学术	398
“人权”讨论与胡适的政治思想	424
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	448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与中国的反教运动	477

第一编

民国时期的政党与 国会政治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

——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辛亥年间各派政治势力最为关注，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也最招致非议的一句政治口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或许找不出其他政治口号曾经招致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批评。不仅历史当事人攻击，旁观者谴责，就连时过境迁之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几乎众口一词予以批评。其实，“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可以并且实际产生了促成中国政制近代转型效应的政治呼吁。民初政党政治格局的形成，国人对共和民主政治的追求当然是主要原因，但章太炎口号的适时提出，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既有的批判明显包含对于该口号作为历史文本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在政治实践层面，这一误读以及由此展开的批判反映了国家政制转型过程中政治利益的复杂性与政制思想建设的滞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北洋时期”议会制度在中国政治中被排挤出局的历史后果；在学术研究层面，则直接影响到了历史事实重建的准确与完整。

1928年，当北伐成功、史学撰述也因一个时代结束而再现生

* 本文系提交2006年8月25~27日在北京召开的“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教授作为本文特约评论人在会上指出，辛亥之后政党政治蔚为潮流，太炎口号固然包含深意，有以促成，但其口号也是时代的产物，不宜过分突出其作用。对于这一意见，本人表示认同，并根据这一意见对原文做了部分修改。对张教授惠赐建设性意见，谨致谢悃。

机之际，章太炎尝撰文感叹清季民初无“信史”：

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至武昌倡义凡十一年，自武昌倡义至今又十七年。事状纷掣，未尝有信史。故旧或劝余为之，余犹豫未下笔。盖身不与其事，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干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①

在太炎看来，为了“同志”之“光宠”而“书其美”并“隐其恶”，是导致清季民初无“信史”的重要原因。太炎曾“身与其事”，是革命的当事人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者，所言应该也包括对于这一口号的认知和历史评价。太炎之后，虽然历经数十年，对清季民初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就，对这一口号，也有学者提出颇具价值的学术见解，但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②既有研究大多经心注目于口号之由来及其含义，对于口号产生的影响特别是革命党对这一口号持续不断的批判对尔后中国政制走向产生的影响却较少留意，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政制史研究中最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部分。本文拟以这一政治口号所由产生的特殊语境之还原作为研究出发点，辅以相关政治主张之链接，弄清口号

① 章太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1928年7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第821页。

② 参见徐辉琪《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由来及评价》，《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该文认为这一口号“实际代表了立宪派、旧官僚的要求，成为立宪派、旧官僚在未组织起政党的情况下反对同盟会的行动纲领”。徐辉琪：《略论孙中山与民初政党政治》，《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该文对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以及孙对该口号的批判作了事实整理。张勇：《再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该文对这一口号的广泛流行与当时多数国人政党观念的关联性以及后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政治需要作了探讨。陈宇翔：《变换反复中的真相：章太炎的政党思想探微》，《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该文对章太炎的政党思想作了初步的梳理。但几乎所有论著都未能注意到太炎口号遭遇的批判如何影响了后来中国政制建设的发展方向。

的真实意蕴，并以此为基础，对同盟会因应形势，从“革命党”蜕变为议会政制下的“政党”，又在对太炎口号连续不断的批判中回归“革命党”的思想政治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党及民主宪政的历史命运，作一初步探讨。

一 口号的提出及内涵意蕴

问题的探讨自然还得从口号的提出开始。1911年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登载了太炎的一份电文：“日前章炳麟复武昌谭人凤诸人电云：‘武昌都督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文。’”^①据徐辉琪教授考证，文中提到的谭人凤等人的电报很可能是上海《民立报》1911年11月30日刊登的由谭人凤、刘揆一等14位“鄂同志”致包括章太炎在内的各省“同志”的公电。电报内容为：“民国渐次成立，请诸君速来鄂组织一切，并乞与敝处赴沪代表居正、陶凤集等接洽。”^②太炎复电的落款时间为“文”，“文”在韵目代日法中指代十二日，在民国建立、历法变更之前，电报落款通常采用农历，因而太炎的复电应该是在当年农历十月十二日，即公历1911年12月2日。

20年后，太炎在一次题为《民国光复》的演讲中提到了口号的来历。他说：武昌起义发生之后，身在汉阳的黄兴“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乃“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但“克强未纳”。^③

^① 《章炳麟之消弭党见》，1911年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第3367号，第5版。

^② 徐辉琪：《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由来及评价》，《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252页。

^③ 章太炎：《民国光复》（1933年10月10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43页。

按照太炎的说法，口号系黄兴在汉阳征询其意见时提出。由于汉阳在1911年11月27日已被清军冯国璋部攻陷，随后黄兴即辞去民军总司令职，由武昌去了上海，因而口号的提出应当不会晚于11月27日汉阳城陷之前。^①如果太炎没有记错的话，这应当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口号提出的最早时间。

这样一来，有关口号所自出及所出时间就有了两个原始版本。过去学者研究这一问题，总是采取非此即彼的逻辑判断，似乎同一口号只能有一个诉说对象。有学者甚至认为，黄兴“远询”太炎，“或即指谭人凤等人的电报”。^②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太炎演讲时说的是黄兴为“扩大同盟会”之事“远询”太炎，谭人凤等人的电报则是要求各地“同志”来鄂参与临时政府的组建。黄兴没有在谭人凤等人的电报上署名，已隐约透露出两者不是一回事的信息。而黄之所以不联署谭电，或者正与此前太炎已对其表示应消去“革命党”有关。轻易地否定前者，或将两者混为一谈，事实依据都不充分。为什么有了复谭人凤等人的电文就不能有与黄兴讨论扩大同盟会的事情发生呢？黄兴在孙中山归国之前，是同盟会在国内的主要领袖，且被推举为湖北方面的民军总司令，肩负着“统筹全局”^③的重任。在武昌起义，天下云集响应，各种政治力量为筹组临时政府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同盟会应如何参与政府无疑是黄兴等革命领袖必须思考的问题。黄兴为此征询太炎的意见，完全顺理成章。尽管太炎对此事的记载尚属孤证，缺乏旁证以证其真，但也没有材料能证其伪，因而两个版本、两种不同说法同时成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①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1868～1918）》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364页。

② 张勇：《再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34页。

③ 《致周震鳞谭人凤书》（1911年11月初），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华书局，1981，第78页。

至于太炎口号的内涵，“文”电已有明确交代，具体包括如下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乃开宗明义，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的主张，认为随着各地以“革”清朝之“命”为目的的义军兴起，以同盟会为代表的秘密组织——“革命党”就应该取消；惟有各方出以公心，组建临时政府之事方能取得成功。第二层意思是对取消“革命党”的原因作出解释：“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太炎认为，由《民立报》转发的公电，署名之谭人凤、刘揆一、刘公、马伯援、孙武、胡瑛、田桐、蒋翊武、查光复、杨玉如、蔡济民、覃振、丁复等人，以及包括太炎在内的十余受众，都是或者至少被认为是革命党人，难免造成“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的印象；而吁请其党人“来鄂组织一切”，则显然构成“欲以一党组织政府”之嫌疑，有违“天下为公”的宗旨。第三层意思是对如果不采纳其意见的后果作预测：“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电文最后一句话十分耐人寻味：“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所谓“能战”是指有能力抵抗袁世凯的军事压力，扭转湖北方面的战争形势。不过，这只是太炎的一种假设。事实上，早在太炎“文”电发出之前的 11 月 27 日，汉阳便已失守，证明湖北革命党人并不能“战”。在这种情况下，太炎认为，如果革命党人仍然坚持“党见”，就会破坏联络各方反清力量组建临时政府的政治“大局”。

不难看出，太炎之意，是欲联络各方面的反清力量，推进筹议中的临时政府的建立，担心出现以同盟会单方面的力量来组织未来政府的政治局面。从当时湖北革命党人所处的军事、政治形势及革命党的政治举措来看，太炎出此通电或者并非必要。因为湖北党人在其通电发出之前，已经在联络江浙方面以立宪派为主宣布独立的人士召集各省代表会议，筹组政府；其拟议推举的临时政府首脑，并非“革命党”领袖孙中山，而是“附义”的旧官僚黎元洪。这证明太炎之忧多少有类“杞忧”，或许太炎通电本身就是他所代

表的光复会与同盟会矛盾的产物也未可知。

尽管主观动机上有可能包含党争色彩，但太炎主张包含的政治思想命题却值得关注。太炎主张销去“革命党”，是因为“革命党”系以推翻现政权为职志的党，一旦这一目标实现，其历史使命便宣告终结，除非改建“政党”，否则不便与闻新政权之建设。易言之，“革命党”非“政党”，依照独立各省亟欲效仿的西方国家通例，共和政制只能由政党依托议会舞台推进。这就提示了未来议会政制下政党建置的思想政治命题。

太炎主张政党政治，但其思想却常因言论表述极端而被误解。1911年10月下旬，迫于革命压力，清政府开放党禁，各色各样的政治团体于是接踵产生，中国的政党建设提上日程。针对这一情势，太炎在槟榔屿《光华日报》发表题为《诛政党》的长文，猛烈抨击“政党”，给人以反对政党政治的鲜明印象，也给此后提出的“革命党消”的口号提供了解释空间。^①但细读太炎文论，耸人听闻的“诛政党”说似乎并不包含对政党政治的否定，而是在以太炎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中国各色“政党”的不满，冀以西方政党政治为楷模，将中国的政党政治导入正轨。观其对中西“政党”的比较，可知其真实立场：

天下之至猥贱，莫如政客。挽近中夏民德污下，甚于暂人，故政之猥贱尤甚。欧美政党，贪婪兢进，虽犹中国，顾尚有正鹄政府，有害民之政，往往能挟持不使遂行，自及秉政，他党又得议其后，兴革多能安利百姓，国家赖焉。汉土则独

^① 王汎森教授认为，太炎对现代政党政治持激烈的反对态度，“故他提出‘诛政党’，并结合‘诛政党’及反立宪、反代议等主张以全盘否定西方的议会政治。”王教授认为，太炎反对政党政治的主张，是他在辛亥年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根本原因。见氏著《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第139页。

否。盖欧美政党，自导国利民，至中国政党，自浮夸奔競。所志不同，源流亦异，而漫以相比，非妄则夸也。^①

太炎将中国的党人分为七类，认为“综观七类，操术各异，而競名死利，则同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也。”尽管言辞激烈，但毕竟为文之目的不是真要诛灭政党，而是希望将打江山的“革命党”改造成参与政权的“政党”，故太炎在文末写道：“苟我夏齐民，不忍亡其宗国，赫然振作，以恢九服，中国既安，各依其见为政党，内审齐民之情，外察宇内之势，调和斟酌，以成政事而利国家，不亦休乎？”^②对于政党建置期望之殷，溢于言表。

后来的政治实践证明了太炎的政党政治立场。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独立，清朝政权呈土崩瓦解之象，新政权的建立提上中国政制建设的议程。为了促进各派力量的联合，推进按照共和制度的规定将要实施的政党政治，太炎与程德全等联络部分革命派与立宪派人士，于1911年底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并出任会长。次年春，联合会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开会，改“会”为“党”，宣示政纲，太炎出任理事，并在会上阐述了联合会改党的原因及其宗旨：“当此区夏廓清，真正政府必当出现，故应此时期，改名为统一党，至本党宗旨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③统一党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政党。^④以组建“政党”的方式来消弭“革命党”，使政治革命转入政治建设，应该是太炎提出其口号的初衷。

太炎口号包含的另一重要政治思想命题是反对同盟会“一党

^①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1868～1918）》上册，第352～358页。

^②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1868～1918）》上册，第352～358页。

^③ 《联合会改党记事》，1913年3月3日《大共和日报》第3版。

^④ 章士钊在统一党成立之后曾撰文指出：“三月二日为统一党成立之期。……吾国无政党，有政党自是日始。”见氏著《论统一党》（1912年3月4日），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2卷，文汇出版社，2000，第65页。